

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爲寄殺（案）殺

言夫淫他室若寄（案）殺之猶也（案）殺音加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案）訓棄

夫而逃子不得母（案）正義言妻棄夫咸化廉清大治濯俗

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執和安敦地莫不（案）正

反（案）黑若（案）潔人樂（案）休（案）不（案）後（案）敬（案）奉（案）正

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案）正義從音才用反烈美

美請刻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案）集解

此石志丹陽有江乘縣（案）正義山東膠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編

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清波也（案）正

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

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案）正義鼓

音若故反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

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

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

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案）正義即山也（案）在萊州弗見至之衆見

巨魚射殺一魚遂壺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案）集解徐廣曰

渡河而西（案）正

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

集

《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编委会

主 编：潘盛国
副 主 编：龚振山 丁振武 王学德
编 委：潘盛国 龚振山 丁振武 王学德
 韩明彦 孙维诚 徐研敏 张黄元
 王云霞

编者说明

一、本书所收论文是从首届“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所收论文中选出来的，同时节选了近年在琅琊暨徐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论文。

二、遵循“尊重作者，尊重作者观点”的原则，所选论文均系作者全文，除作者自己修改的以外，由于受篇幅和容量所限，编者对个别的文章不得不进行删节和编辑技术处理，请作者和读者予以谅解。

三、各作者引文部分以外的个别不影响观点的文字，例如“琅琊”、“琅邪”、“琅玕”统一写作“琅琊”。

四、大部分引文我们都作了校对，小部分引文因为资料有限，则以作者原稿为准。

五、我们热诚欢迎在琅琊暨徐福研究中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坚信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史为证，以物为鉴，深入探索，琅琊暨徐福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各部门通力协作，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中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恳请关心支持琅琊暨徐福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不吝指教。

编者

1995年10月12日

序 一

李永先

琅琊，古作琅邪，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城邑。古老的齐长城在其北边，春秋时期，著名的吴、齐海上大战也在这一带海域。周代齐国八神之一的四时主神祠也在这里。琅琊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五大海港之一。齐桓公打算东游海上，“南至琅琊”；齐景公也曾想“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春秋末，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为了进一步经营北方，逐鹿中原，便从会稽（今浙江绍兴）迁都琅琊。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短短十二年中三次巡视琅琊。第一次来时，“大乐之，留三月”。越王勾践和秦始皇都曾在这里建筑高大的琅琊台，遗址至今犹存。秦始皇还曾在这里建碑歌颂自己的功绩。秦二世来琅琊时也曾加以补刻。秦碑至今尚残存八十多字，为我国保存字数最多的秦碑瑰宝。

汉武帝也曾多次来过琅琊，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太史，可能也来过这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知密州时，登琅琊台，写过一篇《书琅琊篆后》文章，盛赞秦篆：“绝人者文字之工。”

越王勾践是否迁都琅琊，学术界尚有不同认识。我认为越都琅琊的史实是可信的。齐长城位于琅琊以北五十公里的东于家村入海，这就有力地证明，琅琊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时期不属于齐国。越人以舟为车，依靠水上交通。琅琊北有大珠山、小珠山作屏障，交通便利，形势险要，越国在此建都完全可能。至于越都琅琊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竹书纪年》记载：“翳 33 年（公元前 379 年）迁于吴。”在此建都的时间约为 90 年左右。越都迁吴（今江苏苏州）以后，越国仍占有琅琊。《水经注》记载：“越无强为楚所伐，去琅琊。”

这是说：又过了 35 年，无强 12 年（公元前 344 年）越国才丢失了琅琊。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琅琊还是秦方士徐福活动的主要地区。东亚地区广泛流传着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秦代著名方士徐福两次见秦始皇都是在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 28 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率领文武百官东巡琅琊，“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次入海绕山东半岛，去庙岛群岛，沿辽东半岛南岸东行，过鸭绿江口，沿朝鲜半岛西岸南行，经济州岛，至日本北九州。这一条北方沿岸航线，逐岛相望，便于补充淡水和避风，航行比较安全。公元七世纪以前，一直是汉魏隋唐时期中日交往的通道。

徐福第一次出海又回来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始皇 37 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又率文武百官巡视琅琊，在此又见到徐福。徐福花费大量资财怕遭谴责，便谎说为海中大鲛鱼所阻，故没能得到不死药。请求配备弓箭手再次入海。可能是到日本后遇到土著的抵抗，回来寻求武装。秦始皇答应了徐福的请求，“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并与徐福等一起乘船北上，“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今烟台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这才放了心，认为把大鱼射死，是为徐福入海采药扫清了道路，遂回返。秦始皇回返后，徐福也必然沿北方航线再次东渡。

徐福两次东渡都是从山东半岛启航，所率领的童男童女、百工、弓箭手等都应是齐人，他们把齐地的先进文化、先进工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列岛，使处于石器时代过着渔猎生活的绳纹文化时代的日本，迅速发展到了使用金属工具、广泛种植水稻的弥生文化时代。

在日本，人们认为徐福是把中国大陆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带到

日本的圣贤。他教日本人种植水稻、捕获鲸鱼、栽桑养蚕、纺线织布、采药治病……日本民间尊徐福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

徐福东渡，必然带去了齐国的原始宗教信仰，齐人所信奉的八神主，在日本开国神话中都能找出来。有人指出：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出土的弥生文物，从器质到造型都与中国同期文物相同或相似。1980年，佐贺金立山麓出土一件2000多年前的中国大陆烧制的陶器，里边还藏有已经碳化的谷种。当地人说：这是徐福一行带去的遗物。

弥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使用金属工具和种植水稻。高度发达的中国金属文化传到了日本，使日本人民的祖先学会了使用金属工具。金属工具有青铜和铁制的两种。青铜器中有一种铤，就是古代居住于山东的牟族发明的。

水稻的广泛种植，使日本人迅速从采集渔猎迁徙生活发展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从而摆脱了饥饿的折磨。根据日本出土的水稻分析，稻种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有人说是从长江流域传入的。但长江流域的稻种是籼米和粳米两种而以籼米为主。日本的水稻则是粳米。栖霞县杨家圈出土的稻种则是粳米，因而有人认为日本的水稻是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而传至日本的。中国水稻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早，但处于石器时代渔猎经济时代不可能大量种植，只有到公元前三、二世纪，徐福东渡带去了金属工具和先进的种植技术以后，日本的水稻种植才能迅速推广开来。

弥生时代的旱地农业也很发达。从日本西部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农作物有大麦、稗子、荞麦、大豆、小豆、豌豆、蚕豆、瓜、梅、桃、杏等。这些作物也不是石器时代的日本所能培育出来的。这些作物与山东地区的作物有密切关系。齐桓公北征山戎取得了大豆种，齐国盛产大豆。大麦也称粦，为古代山东居住的牟族培育的作物。有人化验弥生时代的桃核，与山东肥城桃系同一品种。《汉书·地理志》记载：琅琊郡有稻县、稗县，以产稻、稗著名。蚕豆、梅、荞麦等，

今日山东已很少种植,但地方志记载,在古代却是山东广为种植的农作物。古代日本关西的这些农作物,应是从山东半岛传去的。

司马迁写《史记》时,我国对日本列岛的认识还很模糊,当时对徐福东渡的史实,还覆盖了许多神秘色彩。我们今天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来正确认识徐福东渡的伟大意义。徐福东渡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徐福是比哥伦布早 1700 多年的大航海家,是中日、中韩交往史上的伟大先驱者。徐福东渡的研究,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日、朝、韩等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研究课题。

近几年,中日两国相继掀起了徐福研究热潮,山东省及龙口市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河北省盐山县都先后成立了徐福研究会。1993 年,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徐福研究会在北京先后宣布成立。日本方面,东京、大阪、佐贺、和歌山县新宫市、山梨县吉田市等地都先后成立了徐福会或徐福研究会。1992 年还成立了全国性的日本国徐福会。韩国济州道、香港也早已成立了徐福会。目前从事徐福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已从中、日、韩三国扩大到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广大华侨、华人中去,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琅琊是一处有极大旅游开发价值的文化名胜之地。在青岛市和胶南市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于 1993 年 11 月宣布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浙江和山东的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学术讨论会论文的结果,也是对近几年琅琊暨徐福研究的一次检阅和交流。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必将对徐福东渡及琅琊文化的研究和旅游开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5 年 6 月于济南

(本文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序 二

李连庆

《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出版了。这是一本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好书。

琅琊台是中国黄海海滨的千古胜地。

早在公元前 472 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北上迁都琅琊，在此筑台，称霸中国。

秦始皇在灭了六国、统一中国之后，曾三次巡游琅琊，重新修筑和扩建琅琊台，刻石颂德，并两次召见方士徐福，派遣其率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到三神山寻求所谓长生不老药，因而成为徐福启航渡海之地。

琅琊台古迹繁多，名人荟萃，景物幽美，文化灿烂，有“东国胜地”之称。秦二世、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苏轼等曾到此游览、观赏，留有遗迹和诗文。令国内外人士景仰、向往。

为了弘扬祖国古老的、民族的优秀文化，胶南市拨出巨资修复琅琊台遗址和增添新的景点，如在琅琊台上竖立徐福东渡群雕，再现天下一帝、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的光辉形象，世界上第一个远航东渡日本的伟大友好使者徐福的隽永英姿。建起了一座仿古的望越楼，供奉著名的卧薪尝胆、决心复国的春秋末期最后一位霸主勾践眺望故乡的铜像。还新建了徐福殿，供奉徐福像。并且成立“琅琊暨徐福研究会”，举办了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对琅琊古迹的修复整理、对徐福的研究,探讨秦汉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开展对外交流,兴办旅游事业,促进文化、经济的合作和发展,为胶南地区的建设和人民福利服务。我认为这个方针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国内不少地方成立了徐福会,修建了不少遗迹和景点,开展对徐福的研究。我建议大家不分彼此,团结起来,携手并进,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特别是研究徐福的历史功绩、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把重点逐步放在对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友谊,推动文化、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而不要在徐福故里等次要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影响团结,忽视在主要问题上的研究和工作,中国徐福会倡导举办徐福遗迹探访和研究文化、经济座谈交流,就是本着上述宗旨的一个尝试。“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个活动,是值得赞许和称道的。

这本《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资料丰富,论而有据。我相信,徐福研究者和广大的读者将从中汲取有益的知识 and 启迪。

1995年7月25日,于北京

三里河南沙沟家中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徐福会)

目 录

编者说明	(1)
序一	李永先(2)
序二	李连庆(6)
1 论琅琊台古港是徐福东渡的起始点.....	孙光圻(1)
2 琅琊是徐福东渡的启航港.....	张树枫(13)
3 论徐福东渡由古琅琊港启航.....	王景东(36)
4 徐福东渡原因新探.....	李永先(41)
5 徐福东渡出海初探.....	侯文程(58)
6 琅琊台及徐福东渡启航地考述.....	王云霞(69)
7 琅琊台海市与徐福东渡.....	韩明彦(74)
8 徐福琅琊东渡溯评.....	宗仲曲(79)
9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	
——从远古时代到徐福东渡的历史考察	
.....	牟元珪(84)
10 徐福求仙与东渡的道家渊源	徐研敏(103)
11 浅议徐福东渡日本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	刘云敏 陈济敏(109)
12 越都琅琊考辨	李永先(114)
13 越国迁都琅琊析	钱林书(127)
14 越国迁都琅琊辨	林华东(135)
15 秦琅琊台漫游杂谈随考	陈 平(141)

- 16 论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及山东沿海…………… 朱亚非(159)
- 17 琅琊其地与徐福其人…………… 孙维诚 崔树秀(169)
- 18 也谈徐福与琅琊…………… 张黄元(175)
- 19 琅琊港衰落原因初探…………… 李文渭 范浩儒(183)
- 20 越王“观台”与始皇“层台”非一台考辨…………… 韩玉德(192)
- 21 陈氏三量与灵山卫和琅琊台…………… 孙敬明 王桂香(196)
- 22 琅琊台与《琅琊刻石》考略…………… 于书亭 王景东(204)
- 23 徐福与琅琊古迹考察纪实和开发研究之建议
…………… 张树枫(215)
- 24 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 苏兆庆(241)
- 25 齐刀“安阳”地望考…………… 毛公强(247)
- 26 徐福当属琅琊籍
——兼析赣榆、黄县之徐福故里说
…………… 张树枫 龚振河(251)
- 27 徐福里籍纠谬及推阐…………… 韩玉德(273)
- 28 徐福和徐福传说…………… 安志敏(282)
- 29 徐福东渡浅议…………… 崔坤斗 逢芳(287)
- 30 徐福东渡至何方…………… 鲁海(300)
- 31 琅琊台与李斯和徐福
——悄然兴起的“徐福研究热”…………… 杨义民(305)

论琅琊台古港是徐福东渡的起始点

孙光圻

徐福东渡从何处起航,是徐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关系到徐福东渡航线本身的考订,而且也涉及中日古代航海文明交流史的研讨。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以下三个角度说明今山东省胶南市所辖属的琅琊台古港,是徐福船队东渡的最佳起始点。

一、文献学角度的论证

笔者之所以认为徐福东渡是从琅琊古港出发,首先是由于从文献学角度考证,正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泰山北斗——西汉初年的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名著《史记》中写下了两段与徐福东渡起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文字。其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条载:“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其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条载:“始皇出游……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

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上引司马迁所述徐福起航地资料的可信度如何呢？这是十分关键的。我以为，探讨某一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应抓住三个互相串联的环节：一是所引文献本身是否可靠，也即文献作者的记载是否真实，是否可信；二是所引文献，特别是为文献所利用的原始资料的问世年代，离其所载事件的时间间隔是长还是短；三是所引文献是直接记载其人其事，还是间接记载，甚至没有记载其人其事，而纯属后人的推测与演绎。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三个环节必须是将它串联起来，统筹兼顾，而不宜将之分割开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先看环节之一：众所周知，司马迁秉笔直书，去伪存真的治史风范，是古今中外史学界所一致公认的。太史公写《史记》时，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他从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接任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后，即检索档案，蒐集资料，广引博采，实地调查。凡多疑者审慎，凡多阙者不录，其记载的可信度与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指出的是，从环节之二与环节之三考察，司马迁所录徐福入海一案是直载其人其事，并非间接记载或推测与演绎，故其资料可信度，决非一般的笔记、稗史、杂录等可以比肩的。而尤其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写《史记》，其素材之采编应可溯至其父司马谈之手。司马谈在西汉建元初（前140~135）即负责要求极严的官方正史的编纂工作，而其时离徐福东渡仅不过半个世纪左右，当年目击耳闻斯役者还健在世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谈，对徐福东渡这件震动朝野、牵动万民的秦代大事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而袭父任职史官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必然会继承并应用其父的调研所得，这也完全是合情合理之举。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在论及“叙事之信”时说：“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①。鉴此，从上述三个环节串联考察，治史严谨的司马迁，其

所直接记载的“世近”事件——徐福东渡一案，决非虚诞之言，其资料的可信度应予肯定。

既如此，笔者认为，据司马迁的记载，徐福船队的东渡起航点，应该是秦代的琅琊台古港，亦即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附近的海湾。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研读一下司马迁所写的上述两段有关文字，就不难获得明确的结论。试看，第一段秦始皇二十八年条，写的是秦始皇东行郡县，抵达琅琊，又作琅琊台，随后即碰到徐福等上书言事。他在琅琊批准了这一奏请，并遣徐福带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段记载仅说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的决策是在琅琊作出的，而徐福东渡不一定就是在琅琊起航的。我认为，这种疑虑不无依据，但从情理上分析，似是不必要的。因为秦始皇作出徐福东渡决策的所在地琅琊，本身即是秦代主要海港的所在地。此等涉及越境远航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关系到秦始皇长生不死切身利益的入海求仙之举，他必然要将之严密地控制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岂能任凭徐福一行舍近求远，在其他地点集结起航呢？！故而，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其设想为，秦始皇伫立在琅琊台上，目送徐福船队在琅琊台港湾中启锚远航。当然，秦始皇下达徐福东渡的命令后，徐福为征集船只与人员以及训练船队的航海能力，可能会在琅琊附近的沿海四出活动；或者船队在正式驶离琅琊台古港后，在沿岸的航行途中，也可能会在其他港湾里开展避风抛锚、增补给养、休整集泊与探测航道等活动。这些正式起航前后的海上作业，也许会在其他港湾地区生活的居民中造成影响或错觉，以为他们那里是徐福东渡入海的起航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除《史记》而外，诸多的其他文献、特别是后世出现的诸地方志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一点与徐福东渡有关的文字或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一线有这么多地方（诸如黄骅、胶州湾徐山、登州湾、海州湾等）都声称自己是徐福东渡的起航地了。

不过，如果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二十八年条中还没有直接点

明徐福船队东渡是从琅琊台古港起航的话，那么，他在秦始皇三十七年条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一条中，他不但讲到了秦始皇与徐福在琅琊再度面晤的情景，而且还特别提到了秦始皇为消除徐福船队“为大蛟鱼所苦”的忧虑（或可理解为徐福之遁词），还亲自随船队出海，“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这段最初的航程是“自琅琊北至荣成山”，也即自琅琊台古港出发后，向北沿岸航行，直达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海域。然而，秦始皇随航至此，仍“弗见”大蛟鱼，于是船队绕过成山角续航“至之罟”（今山东省烟台市的芝罘岛附近水域），终于“见巨鱼，射杀一鱼”。由此秦始皇“遂并海西”，登陆上岸，与徐福一行分道扬镳。而徐福船队则继续北上，以庙岛群岛为中介，跨渡渤海海峡，驶向更远的异域。

巡查涉及徐福东渡起航地的所有文献并参相印证，我以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下的上述两段关于徐福东渡起航地的文字，就其文献的可靠性、历史的真实性与叙述的直接性而言，是无出其右的。

二、航海史学角度的论证

笔者之所以赞同琅琊台古港是徐福东渡起航地的说法，除了上述司马迁留下了确凿可靠、明白无误的文献记载外，还因为从航海史学角度考察，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琅琊一直是中国北方沿海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徐福船队从琅琊台附近的港湾集结出发，完全是一种必要和可行的最佳选择。

琅琊台古港，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夏河城东南的琅琊山琅琊台濒海处。它面临浩瀚的黄海，北有灵山湾、胶州湾，南有海州湾；沿岸北上可绕航山东半岛进至渤海，沿岸南下可沿苏鲁海岸驶入东海。对于无法脱离陆岸视界的古代早期航海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满意的地理位置。故而这一带地方的远古先民，夙有航海活动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历史上早期的北方港口，如琅琊、黄睡、之罟、碣

石等，大多集中在山东半岛环岛一线，其中，尤以琅琊的声名最为显赫。诚如以研究中国古代港口与航运而闻名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所说的：“为海港而载于史乘者，以琅琊为始”^②。

琅琊，古属齐地，其始祖太公尚助周武王“平王而王天下”，被封于“齐营丘”。齐太公“劝女功，极技巧，便渔盐之利”，“通商工业”^③，为开发齐国经济革路篮缕，功不可没。然而，直至春秋前期，齐向东方通往大海的途径仍为由莱夷族、东夷族等土著所组成的莱国所阻。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拜大政治家管仲为相，整理国政，扶助农商，置办盐铁，刻意兼并，终成一代东方霸主。自此，“通齐国之鱼盐于东夷”^④，逐渐将势力范围扩至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而琅琊作为齐国进行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也开始见诸史乘。

《管子·戒篇》中说：“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琊’。”对之，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辑著的《读史方輿纪要》中也说：“管子，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琊。”^⑤又据《孟子·梁惠王下》中说，齐景公在出游时，也曾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朝舞（今山东半岛东北端成山），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关于齐景公绕航山东半岛之游，则除《孟子》而外，史书上亦多有记载。如《韩非子》中说：“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⑥；而汉古籍《说苑》中又说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⑦。按，“少海”即今之渤海。景公巡游，从之罘至琅琊，其沿岸航行里程相当漫长，且在海上驻留时间长达半年，这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莱国后，环山东半岛海上航路已尽操齐人之手，否则就不可能在海上自由自在而“六月不归”；第二，国君出游的皇家船队谅必已具相当规模，航具不但安全，而且舒适，否则就不可能“游于海上而乐之”；第三，作为景公巡海目的地的琅琊，其港湾条件与设施一定相当优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巡航船队的安全进出与锚泊。关于这最后一

点,《管子》中所谓的“我游犹轴转斛”即为明例。“犹轴转斛”,据孙星衍注为,“欲如轴舳载斛石”,也即船队中已有粮食后勤等船舶加入而编队航行。鉴此,我赞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说法,即早在“吴越北上前”,琅琊即为“船舶辐辏”的海港了^⑥。

《战国策》中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⑦;《续崂山志》中说:“齐人知有琅琊,不知有之罟。”这两条文献记载说明,当齐之世,东方的琅琊是齐国最主要的海上门户,其航海与海防地位在北方诸港中是独占鳌头的。春秋期间,群雄割据,互相讨伐。中国大陆东部“边于海”的诸侯列强,如齐、吴、越三国,“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入人要害。”^⑧海战,已成为其时间鼎争霸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元前485年爆发的齐吴海战,即是在琅琊附近的黄海水域中展开的。当时,在齐南面濒江临海的另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海上强国吴国,国势日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破越,北进与齐争霸。据《史记》称,其次年,也即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并藉此为由,派大夫徐承统率舟师“从海入讨齐”。结果,为“海王之国的”“齐人败之,吴师乃去”^⑨。这次被学界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的交锋场所究竟在何处,司马迁未予明言。然据《左传》哀公十年条在记载同一事件时称,“吴伐齐南鄙”。按,《辞海》说,鄙者郊野之处。亦可引伸为边郊之处。以此战“从海入讨齐”而观之,是役宜应以吴师攻伐齐国东南部濒海之门户——琅琊古港为正鹄,因舍此而外,在齐之“南鄙”中,实已无可值吴军覬觐之海防要冲了。

自齐吴海战以降,琅琊不但一直是春秋战国列强所刻意求索与着力营建的重要港城,而且也变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学术中心之一。

以航海史考之,在春秋末期最能反映琅琊古港航海地位且有明文记载者,莫过于越王勾践围绕琅琊所展示的三次航海活动。第